

明清以来吴江产业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

陈悦¹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中国 上海 200092）

【摘要】：产业因素通常被认为是影响城镇体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产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城镇体系是比较模糊的。文章选择苏州市吴江区为例，聚焦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这两种产业类型在明清至今这一长时间段内与市镇体系的互动演变过程，从等级规模、职能类型和空间分布三个层面考察产业对市镇体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因素与市镇体系存在着高度的关联性：一方面，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着市镇体系的发达程度；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产业形成不同的市镇体系，其中，一般工商业对应网状市镇组织模式，蚕桑丝织业对应枝状市镇组织模式。无论是传统产业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都应该重视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

【关键词】：城镇体系 演变 产业 一般工商业 蚕桑丝织业 江南地区

【中图分类号】：F29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22）07-0082-11

城（市）镇体系，按其现代意义来说，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一系列规模不等、职能各异的城（市）镇所组成，并具有一定的时空地域结构、相互联系的城镇网络的有机整体^[1]。“城镇体系”首先由西方学者于1960年代提出，源自以中心地理论和系统论为分析方法的在国家地域范围内的经济功能以及功能性的劳动分工的运用，主要探讨城镇体系的演化规律和现状特征^[2]。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城镇体系更是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合理安排人口和城镇布局，充分开发利用国土资源，进行国家（或地域）经济战略部署的重要依据，被赋予更加重大的现实战略意义^[1]。因此，自19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城镇体系研究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与西方研究相比，我国城镇体系的研究更加强调实践性，重点关注区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方法^[3,4,5]、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测度^[6,7,8,9]、城镇体系的演变^[10,11,12,13]等主题，对于城镇体系的演变机制等基础性议题却较少关注，与区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关联性研究更是匮乏。

江南是指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苏南、浙北地区，其核心地带是围绕着太湖的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以及清初由苏州府划出去的太仓州这“六府一州”^[14]。江南地区自明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进入了繁荣期，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大量中小市镇的崛起，形成了体系健全的市镇网络。当前对于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体系的研究是历史学、地理学界的重要内容，已经形成了十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市镇盛衰起伏的时序及数量变动，市镇的地理分布、网络与层级关系以及市镇的类别、功能与活动内容三大研究主题^[15]。然而，正如范毅军所评论的那样，“很多研究都指出江南市镇兴起及其分布的经济因素，但均未就二者之间互为影响的实质过程有深入的探讨。如何落实各种经济或其它因素与市镇地理分布的关系，或许值得再进一步思考”^[15]。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是产业还是市镇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产业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今的市镇体系也不复百年前的模样，这一市镇体系是否仍然体现了产业的影响？当前对于近代以后江南市镇体系的研究较少，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部分几乎处于空白，这对于理解市镇体系的现状造成严重的困难。基于此，本研究从产业视角研究其对江南市镇体系演变的影响，意图一方面考察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另一方面对江南市镇体系的演变在时间上进行补充完善，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江南市镇体系的过去和现在。

作者简介：陈悦（1985—），男，江苏苏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E-mail:danielacm@163.com

1 研究案例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案例区

吴江区是江苏省苏州市的市辖区，位于苏州市最南端，北接吴中区、工业园区和昆山市，西靠太湖，南接浙江省嘉兴市和湖州市，全区总面积为 1192km²，地处水乡，河道纵横，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美誉（图 1）。苏州作为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甚至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毫无疑问是江南地区的核心，其传统产业和市镇空间不仅类型最为丰富，而且保存度相对较好。而吴江是苏州的一部分，是江南地区的典型代表。吴江区尽管行政级别多次调整，但行政区划范围并无多少变化。吴江区主城区之一的盛泽镇是中国重要的丝绸纺织品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在历史上以“日出万匹、衣被天下”闻名于世，有“绸都”的美称。

以明清时期作为考察的时间起点，江南地区的传统产业主要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三大部类。明清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不断集聚增加，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其首要原因在于农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形成了蚕桑丝织业、棉花棉织业两大产业和各类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小型产业，如草席业、砖瓦业、刺绣业等等，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以粮食种植为主导产业的经济结构。其中，蚕桑丝织业、棉花棉织业两个产业规模大、分工细，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并通过“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产销市场旺盛，商贾云集，丝绸纺织产业在江南地区以产业链为纽带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综合性、专业性城镇网络。而其他面向本地市场的小型产业，规模小、分工简单，形成小型市镇网络。吴江区的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尽管都经历了兴衰变化，但仍然保存下来，具有较好的历史延续性，因此是研究产业转型和演变不可多得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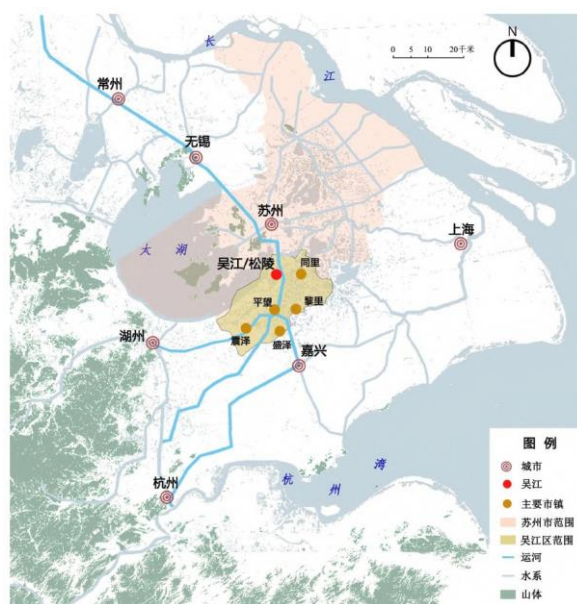


图 1 吴江区在江南地区的区位

吴江南部地区以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发展了蚕桑丝织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形成以震泽、盛泽为中心的蚕桑丝织业市镇网络，是苏州最集中的蚕桑丝织业片区，与浙江嘉兴、湖州的丝织业市镇相连成片；而吴江北部地区属于传统粮食产区，市镇以一般工商业为产业主体，形成以松陵、同里、黎里为核心的一般工商业市镇网络。蚕桑丝织业和一般工商业不仅代表了江南地区的两大产业类型，而且在地理分布上恰好位于以平望为界的南北两部分，有条件展开比较研究。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使用到的数据主要包括产业数据和城镇数据两部分。其中，产业数据包括产品门类、产量、出口量等，主要来自《吴江丝绸志》《盛泽镇志》（1991年版）、《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2、1994、2020年）以及吴江丝绸协会提供的相关统计资料；城镇数据包括城镇数量、市镇人口、户数、商业户数等，分别来自《乾隆吴江县志》、1934年全县工商业调查数据¹、1954年全县工商业调查数据²、《吴江县志》（1994年）、《吴江年鉴（2020）》等。

1.3 分析方法

1.3.1 历史演变分析

历史演变本身是一个连续变化的过程，但为了识别其总体特征的变化情况，根据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历史，本文选择其中几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将江南地区的产业和市镇体系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清时期，以商品经济的兴起和蚕桑丝织业、一般工商业两类市镇的出现为标志；第二阶段为近代时期，以鸦片战争的爆发为起点，以蚕桑丝织业的巨大波动和两类市镇差距的拉大为特征；第三阶段为新中国成立至1990年代，以计划经济的施行和市镇的匀质化发展为特征；第四阶段为1990年代以后，以市场经济的推广和城镇的集聚化发展为标志。在分析过程中，既要强调每个阶段的特征，又要注意各阶段前后之间的联系。

1.3.2 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互动

本研究重点探讨产业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是如何影响市镇体系的。论述过程中将吴江区的产业分为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两类，并分别探讨这两类产业是如何引起市镇体系沿着两条路径分化的。

1.3.3 市镇体系组织结构分析

市镇体系组织结构分析一般包括城镇的等级规模系列、职能类型组合和空间分布特征^[1]。其中，城镇等级规模分析借鉴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方法^[16]，即通过商业户数反映市场规模和市镇等级，通过人口、户数反映城镇规模；城镇职能类型的判断依据是城镇产业构成，以城市职能指数来判断城镇是否拥有主导产业，并以此确定城镇职能类型；城镇空间分布特征分析的方法是将等级规模和职能类型两方面信息落到空间中以分析其分布特征和网络状况，通过城镇密度、人口占比等指标反映。

2 吴江的市镇体系的历史演变

2.1 明清：两类产业兴起和两类市镇的出现

2.1.1 产业——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

市镇的主要职能是承载居民生活、生产（产业），为市镇居民以及邻近乡村农民提供生活、生产方面的各种服务。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般工商业也愈发繁荣。如《盛泽镇志》中记载，“清中叶后，在花园街、南北大街等处，商店鳞次栉比，菜馆酒肆、南北杂货、酱园果品、鱼虾水鲜各业俱兴”^[17]。

①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的一般工商业具有三个特点：规模小，地方特点强，内向型。这些产业的生产和销售的服务范围与半径均限于市镇周边邻近乡村，商品多是地方特色农产品的再加工，这类产业活动是农民或城镇居民为维持生计进行的商品交换。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了产品内容的特色化，并造就了一方土特产，如陆墓、锦溪的砖瓦，浒墅关的草席，木渎的银作、锡作、

铜作，梅李的藤作，璜泾的烧酒，东山、西山的茶、水果等。

②蚕桑丝织业是江南地区的规模最大、分工最细的两大产业之一。蚕桑丝织业在明代以后发展迅猛，如乾隆《吴江县志》中描绘盛泽为：“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街道肩摩。”^[18]与一般工商业相比，蚕桑丝织业具有两个特点：规模大，专业性强；外向型，远销国内外市场。从总体上来看，整个产业链分为桑业、丝业和绸业三大阶段，包括桑树种植、桑叶贸易、养蚕、缫丝、生丝贸易、织绸、生绸加工、丝绸贸易等多道步骤，种桑以养蚕，缫丝以织绸，通过上下游的衔接，最终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是各类专业市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兴盛的重要体现就是生产中各个环节的产品都成为商品，各个专业市场像链条一样连接着各生产环节，有效地组织着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图 2）。由于产业规模庞大以及各生产环节对空间的特殊需求，丝绸产业链在空间上远超出一个市镇的范围，形成了由几十个市镇为节点共同组成的区域产业网络，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最重要的丝绸产地之一。

2.1.2 市镇体系

等级规模。所谓“民人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易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18]，“镇”“市”称谓本身就代表了城镇等级差异。明弘治年间（1488—1505 年），吴江仅有 5 镇（松陵、平望、黎里、同里、震泽）³，而到了清乾隆年间（1736—1796 年），则形成了 7 镇（松陵、盛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震泽）9 市（江南、八坼、新杭、黄溪、屯村、双杨、严墓、坛丘、梅堰）⁴的市镇格局，两级市镇的数量占比分别为 43.75%和 56.25%。在市镇规模方面，据地方志记载，盛泽、平望两镇居民达万户，同里、黎里、震泽、芦墟、新杭、黄溪等市镇规模达千户^[19]，但由于缺少更详细的人口统计资料，很难就不同等级城镇的规模分布做系统性分析。总的来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清代吴江市镇网络在明代基础上有了显著提升，奠定了市镇体系的基本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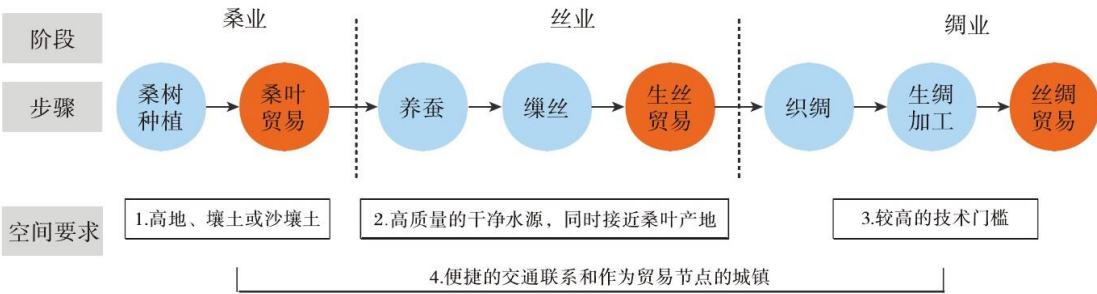


图 2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蚕桑丝织业产业链

职能类型。吴江南部的太湖沿岸地区依靠着历史上形成的塘浦圩田系种广泛种植桑树，同时依靠密集的湖荡系统所提供的优质水源养蚕、缫丝，成为重要的蚕区，而其中心市镇震泽镇凭借着紧靠大运河的优越地理区位，迅速发展成为丝业贸易中心，丝业贸易占据市镇贸易的绝大部分比例。而震泽以东的大片区域利用靠近蚕丝原料产地的优势以及同样优越的交通区位，逐渐发展为绸区，盛泽、黄溪、新杭成为了重要的绸业贸易市镇，以绸业贸易为市镇主导产业。以上 4 个市镇属于以蚕桑丝织业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型市镇，而其余 12 个市镇则是以一般工商业为主导产业的综合型市镇，各产业的占比比较均匀，并无绝对的主导产业（平望镇米粮业除外⁵）。

市镇职能类型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单个市镇的内部组织形式上，而且体现在市镇之间组成的城镇网络上。按照 C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论，由于空间均质、运价相等，容易形成理想的以中心城市为中心的六边形市场网络结构模型。吴江地处长三角的平原地区，空间上是近乎均质的，河网、陆上交通比较发达，比较符合六边形网络结构的市镇网络格局。综合型市镇的职能是服务以其为中心的同心圆范围内的农村地区，这一类型的市镇符合中心地理论的网络市镇组织模式，即市场等级决定商品数量，也就决

定了市场范围，等级越高，商品数量越多，市场范围也就越大。在该种模式下，城乡之间仅有规模等级差异，而无职能分工差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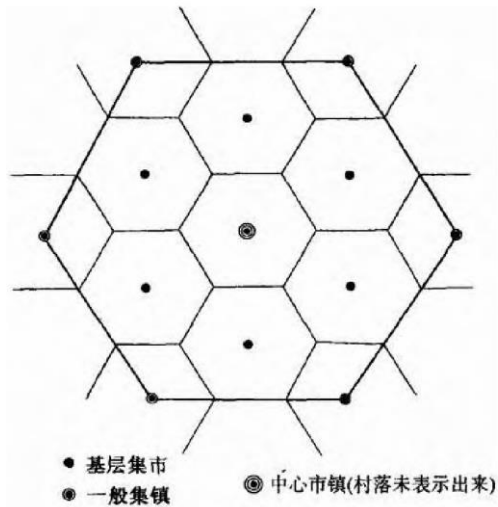


图 3 网状市镇组织模式^[21]

而专业型市镇的经济联系除了内部六边形网状组织模式外，还通过不同产业链条（环节）进行组织，如桑业市镇向蚕业市镇供应桑叶、蚕业市镇向绸业市镇供应生丝，这类镇际联系是通过产业联系（蚕桑丝织业）市镇的主导性模式。因此，专业型市镇网络是一种非均质的、与产业链流向一致的枝状市镇组织模式，这是以交通和产业链组织形成的“产业走廊带状模式”。相比于网状模式，枝状市镇镇际联系模式形成产业带，市镇（镇际）之间的依存度更强（图 4）。

空间分布。以平望为界，吴江县南北两部分的市镇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首先，市镇密度呈现出北疏南密特点。北部有 4 镇 3 市，平均密度 105.02 个/万 km²；而南部则有 3 镇 6 市，平均密度 183.92 个/万 km²。相较而言，南部市镇网络的密度更高，尤其是市的数量更多。其次，市镇职能出现了南北各异的两种情况。北部市镇均为综合型市镇，相互之间是网状组织模式；而南部出现了以蚕桑丝织业为主导产业的 4 个专业型市镇，相互之间是枝状组织模式，这直接反映出南北地区产业之间的差异（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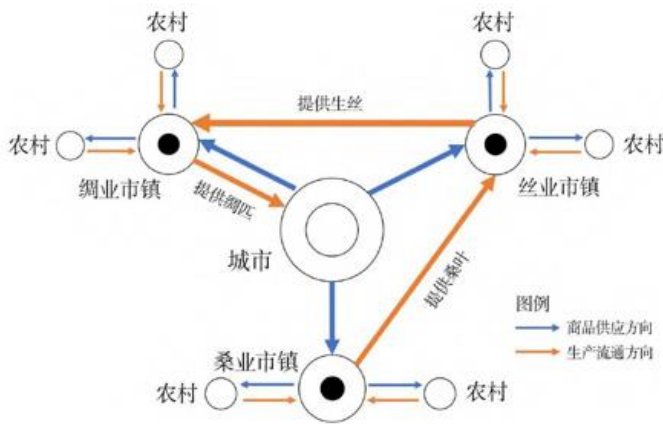


图 4 枝状市镇组织模式



图 5 清代吴江县市镇网络

注：底图为清同治年间《吴江震泽两县图》。

2.2 近代：蚕桑丝织业的波动和市镇体系的差异化发展

2.2.1 产业

①一般工商业。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政治、经济格局十分动荡，但江南市镇服务城乡的性质依然没有改变，只是随着城市工业品的渗入，市镇工商业的结构悄然发生着改变，本地化特征逐渐减弱^[21]。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工业的兴起，商业呈现出向农村地区蔓延的趋势。

②蚕桑丝织业。由于受到国际市场和现代工业的双重影响，江南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出现了巨大波动。产业发展情况大致以 1910 和 1930 年为界划分为三个阶段：1840—1910 年，由于出口量的激增，蚕桑丝织业呈高速发展，如震泽辑里干经出口量从 1880 年的 5450 包提高至 1907 年的 13100 包^[22]，植桑区不断扩大，不少地区从原来的粮食种植转为桑树种植；1910 年前后，由于受到厂丝、人造丝的冲击，生丝出口出现下滑，农民从原来出售生丝转而出售蚕茧，蚕茧逐渐取代生丝成为贸易的主角，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生丝贸易的衰落，如吴江县鲜茧产量从 1913 年的 5.8 万担提高至 1933 年的 257.79 万担^[22]；1930 年以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华战争、解放战争的持续影响，国际贸易停摆，蚕桑丝织业出现了巨大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

2.2.2 市镇体系

等级规模。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不断增加集聚，吴江市镇体系发展迅速。根据 1934 年吴江县工商业调查，全县共有市镇 47 个，比乾隆年间多了 31 个，市镇体系有了巨大的发展。由于存在详细的调查数据，有条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市镇等级方面，按照商业户数的多少将市镇分为三档：①中心市镇（基本上对应清代的“镇”，工商户数大于 200 家）；②标准市镇（基本上对应清代的“市”，民国期间通常以“镇”为建制，工商户数介于 30 家和 200 家之间）；③基层市镇（民国期间通常以“乡”为建制，工商户数少于 30 家）。按此标准划分，吴江县共有中心市镇 7 个（松陵、盛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震泽），标准市镇 13 个（严墓、八坼、横扇、溪港、北厍、莘塔、梅堰、南麻、庙港、坛丘、屯村、桃源、吴淞），基层市镇 27 个（红梨、南

库、北王、北麻、溪南、双杨、流虹、西五、娄下、周庄、茅塔、隐读、八都、开弦弓、大咸、南塘、溪北、庙头、陶墩、南昆、霖安、后练、莺南、澄溪、大谢、红豆、长甸），各级市镇的数量占比依次为 14.89%、27.66%、57.45%。市镇规模方面，分别统计不同等级市镇的人口分布情况，35.1%的人口在中心市镇，24.8%的人口在标准市镇，40.2%的人口在基层市镇，分布比较均匀，可见此时中心市镇的极化现象并不明显，基层市镇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人口比例。

职能类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绸业市镇黄溪、新杭遭到重大破坏，大量绸商及富裕机户迁至盛泽，使得盛泽的绸业更加兴盛。此后直至 1930 年代，蚕桑丝织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整个吴江南部地区的产业普及度更高，除了传统丝业市镇震泽和绸业市镇盛泽外，同里、黎里、芦墟、严墓、坛丘等镇也出现了丝行、经行或织户、染户。从 1934 年工商业统计数据可以分析得知，盛泽、震泽两镇丝绸业的职能指数相比镇内其它行业高出很多，是绝对的主导产业，这两个镇是典型的专业型市镇；而其它市镇的产业都比较平均，无主导产业（平望镇米粮业除外），这些市镇都为综合型市镇。此外，这一时期大量新出现的基层市镇，尽管本身仍然主要发挥了综合性商业服务的职能，但其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是以蚕桑丝织业为主导产业的农村地区，典型的如费孝通笔下的江村（即开弦弓村），这使得蚕桑丝织业市镇网络变得更加体系化、层次化。1934 年正值丝绸产业发展的高峰，自此以后，由于产业的衰落，丝绸市镇的职能指数也出现了下降。

空间分布。由于近代以来丝绸产业的兴旺，自明清以来形成的吴江市镇体系的南北差异进一步强化。对比清代，1934 年北部地区仅增加了 5 个市镇，至 12 个，平均密度为 180.05 个/万 km^2 ；而南部地区则增加了 26 个市镇，至 36 个，平均密度达 735.68 个/万 km^2 ，不仅相比清代有了显著拉升，而且南北差距愈发显著。人口方面，北部地区市镇人口有 46601 人，仅占全部市镇人口的 25.8%，而南部地区市镇人口共 134309 人，占比高达 74.2%，人口分布与城镇分布基本一致。市镇体系的变化显然与蚕桑丝织业的快速发展息息相关，正是蚕桑丝织业的带动，使得商业逐渐向农村（尤其是南部）地区蔓延，从而形成了更加体系化、层次化的市镇体系（图 6）。1930 年代以后，南强北弱的趋势逐渐放缓。这一变化与蚕桑丝织业的衰落是同步的，由于农村产业的消失，大量无业农民涌到城市或大镇中“讨生活”，使得农村地区进一步衰落，而接纳了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心市镇则逐渐向现代化城镇迈进。

2.3 新中国成立至 1990 年代：计划经济的施行和市镇体系的均衡化发展

2.3.1 产业

①一般工商业。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通过建立国营商业体系形成对重要商品门类的掌控，再采用“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江南市镇工商业经过大规模合并后数量大幅减少，单个生产单元的规模则有所增加，尤其是原来分散的个体手工业合并成社会主义工厂后，不少市镇的工业从此发展起来。同时，为了支持国家重工业发展，我国在全国层面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安排下，无论是工业生产，还是商业销售，都必须分门别类地按照国家计划执行。在地域上，对商品采用了分片供应的策略，即一个乡镇供销社或一家工厂负责供应一个片区，在农村地区还设有双代店、下伸店等，负责日常生活所需。



图 6 1930 年代吴江县市镇网络

注：底图为民国《吴江县分区舆图》。

②蚕桑丝织业。生产单元的合并同样影响了蚕桑丝织业。市镇中生丝、丝绸生产职能在近代已经初现端倪，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公私合营、集体化等方式将这些分散的生产单元组建成工厂，如盛泽镇将原来众多分散的、小型的生产单位合并至四家中大型的集体工厂，建立了现代化丝织工业体系。

在计划经济下，蚕茧被纳入国家计划，由国家设立的中蚕公司统一进行定向收购，主要采用分片收购的部署，即在蚕区各乡镇广泛布置茧站，收购完毕后，干茧全数运到指定的仓库，由中蚕公司统一分配给丝绸厂织绸。这一方面使得维系了几百年的生丝贸易取消，传统丝业市镇震泽彻底失去了产业功能；另一方面使得蚕丝原材料全部由国家控制，盛泽丝织企业由“以产定销”转为“以销定产”，也被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然而，过剩的生产力促使了农村社队工业、乡镇企业兴起，其最重要的特点是在国家计划之外谋求生存空间，于是，大量的缫丝厂、化纤厂、丝绵厂等在全县农村地区涌现，带动了地方农村工业化。但与民国时期不同的是，此次农村工业化浪潮并未带来农村商业的复苏，这一现象也被学者们称为“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23, 24]。

2.3.2 市镇体系

等级规模。根据 1954 年的工商业调查，吴江全县市镇数量仅剩 27 个，比 1934 年减少了 20 个，市镇人口更是减少了近 10 万人。在 27 个市镇中，中心市镇有 7 个（松陵、盛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震泽），标准市镇有 11 个（严墓、八坼、横扇、溪港、北库、莘塔、梅堰、南麻、庙港、坛丘、南库），基层市镇有 9 个（龙泉、吴淞、陆港、屯村、贯桥、金家坝、南塘、周家溪、四都）。各级市镇的数量占比依次为 25.93%、40.74%、33.33%，一度兴起的基层市镇很快走向没落。人口的市镇规模分布方面，82.1%的人口在中心市镇，13.4%的人口在标准市镇，只有 4.5%的人口在基层市镇，可见中心市镇的极化现象非常明显。而《吴江县志》（1994 年版）的数据显示，至 1985 年，吴江县共有 7 个县属镇和 17 个乡/人民公社，共 24 个乡镇，相比 1954 年继续减少了 4 个。市镇等级方面，同样按照商业户数的多少对市镇等级进行划分，将市镇等级分为两档：①中心市镇（基本上

对应此时的建制镇，工商户数大于 100 家）；②标准市镇（基本上对应此时的建制乡，工商户数小于 100 家）⁶。按此标准划分，吴江共有中心市镇 9 个（松陵、盛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震泽、庙港、横扇），标准市镇 14 个（北厍、南麻、屯村、金家坝、八坼、铜罗、莘塔、梅堰、菀坪、坛丘、八都、七都、桃源、青云），两级市镇的数量占比分别为 39.13%、60.87%。近代一度有所发展的基层市镇彻底消失，《吴江县志》列举了南厍、溪港等 11 个这类村镇，其仅有的商业主体是由公社商业机构下设的一两家下伸店或双代店，已经又重新回到农村。人口分布方面，76.7% 的市镇人口在中心市镇，23.3% 的人口在标准市镇，可见相比于 1954 年，中心市镇的极化趋势逐渐放缓，其影响力相对减弱，标准市镇却有所加强，整体向着均衡化的方向靠拢。

职能类型。1954 年工商业统计数据显示，仅盛泽镇丝绸业的职能指数相比镇内其它行业高出很多，仍然是城镇的主导产业，该镇也仍属于专业型市镇；而其它市镇的产业都比较平均，并无主导产业（黎里镇米粮业除外），这些市镇也都为综合型市镇。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传统丝业市镇震泽镇，丝业资本额与排名第二的酒酱业接近，丝业从业人员仅比排名第二的米粮业多 4 人，丝绸业的职能指数也不再占有优势，反而落后于酒酱业与米粮业，震泽镇也从蚕丝业专业型市镇转变为综合型市镇。因其生丝贸易取消，丝绸业失去了主导地位，在公私合营以后，震泽镇相继成立了酒厂、米厂、电厂、印刷厂、染厂、机械厂、皮革厂、化工厂等现代化工厂，行业类型日益丰富，反而国营缫丝厂直到 1970 年才正式成立。

空间分布。1954 年对比 1934 年，北部地区增加 1 个市镇，至 13 个，平均密度为 195.04 个/万 km²；而南部地区则减少了 22 个，至 14 个，平均密度降为 286.10 个/万 km²，南北差距缩小。人口方面，北部地区市镇人口为 40396 人，占全部市镇人口的 46.7%，而南部地区市镇人口减少为 46038 人，占比跌落至 53.3%。这印证了自 1930 年代以后，因丝绸业衰落而导致的市镇体系南强北弱趋势的弱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吴江市镇体系匀质化的趋势继续维持。1985 年对比 1954 年，北部地区减少了 2 个市镇，至 11 个，南部地区减少了 2 个，至 12 个。人口数据显示，此时期北部地区市镇人口为 71118 人，占全部市镇人口的 44.5%，而南部地区市镇人口为 88827 人，占比为 55.5%，可见基本上维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市镇体系。值得一提的是，计划经济分片供应的方式与网状市镇组织模式高度相似，城镇网络在此因素的影响下进一步趋于匀质化，如在围湖造田的范围内新出现了两个新兴市镇——菀坪和金家坝，很显然是人为计划所致，符合网状市镇组织模式；而随着蚕桑丝织业的衰落，尤其是自由市场的取消，使得以专业型市镇为依托的枝状市镇网络消失（图 7）。

2.4 1990 年代至今：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市镇体系的集聚化发展

2.4.1 产业现代化和工业化

①一般工商业。1978 年后，改革实际上以市场为取向展开。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本受政策保护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逐渐暴露出问题，乡镇企业曾经一度势头强劲，但在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竞争中显得后劲不足。在此情况下，吴江开启了企业改制浪潮。改制以后，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股份合作制企业，大部分企业的产权性质从公有制转变为非公有制。此时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出现了巨大改变，信息革命引发生产力的巨大发展。逐渐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国需要大力吸引外资，还需要实现自我的生产迭代，迅速推进工业化。据《吴江年鉴（2020）》，吴江当前共形成了四大主导工业产业集群，分别是丝绸纺织、电子资讯、装备制造和光电缆，除丝绸纺织外，后三个产业均是新兴的高科技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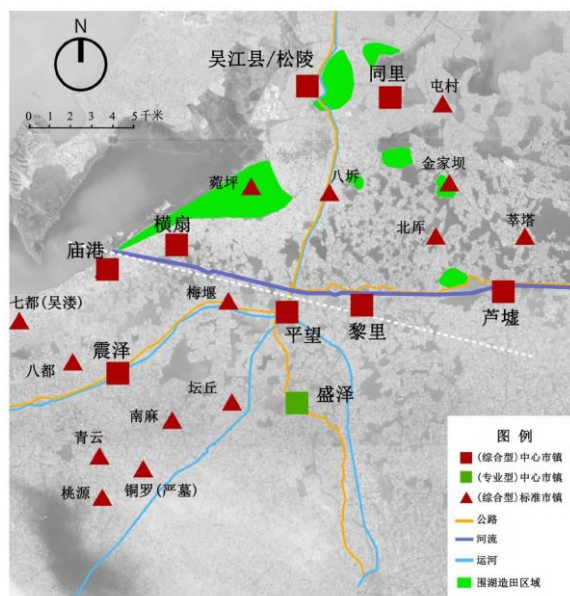


图 7 1980 年代吴江县市镇网络

注：底图来源于 <https://earthexplorer.usgs.gov/>。

商业方面，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供销社系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机制更加灵活、市场敏感度更高、调整能力更强的私营商业。一些古镇自 2000 年左右发展旅游业，各类面向旅游的商业、服务业迅速出现，成为古镇内商业的主体。

②现代蚕桑丝织业。吴江的蚕桑丝织业企业同样经历了改制浪潮，大量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经改制后变成了民营企业，一些亏损的、效益低下的生产企业则纷纷关闭。与此同时，全球蚕桑业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真蚕丝和化纤丝的市场情况向着迥然不同的两个方向转变，前者逐渐被后者取代。全国统计数据显示，1993—2020 年，生丝产量从 9.24 万 t 减至 5.34 万 t，降幅为 42.2%，而化纤产量从 226.87 万 t 增至 6025.12 万 t，增幅高达 2555.8%⁷。在此情形下，吴江原来各个生产环节的真丝绸企业出现全行业衰退，产量持续下滑，大量工厂倒闭或转产化纤；而原来的化纤企业在改为民营后更加如鱼得水、发展迅猛。规模经济使得盛泽的化纤生产企业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继续扩张，而且因贸易的需要自发形成了化纤贸易市场——东方丝绸市场，重新确立了盛泽镇丝绸（主要是化纤绸）贸易中心的地位。

然而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时的蚕桑丝织业生产组织不再是区域内各乡镇互相关联所组成的生产网络，而是借助于全国、甚至全球大市场以及便捷的区域交通，将生产网络扩大至更大的空间层面。真丝绸企业响应国家“东桑西移”战略，将劳动密集型的种桑养蚕和缫丝环节迁移至劳动成本较低的中西部地区，传统蚕桑丝织业市镇仅负责设计、机器织绸和销售。而化纤的原料是从石油提炼而来的聚酯切片，因此更不需要本地化的原料提供，只需直接联系外地的炼油、石化产业，不少大型化纤企业也将产业链继续向前端产业扩展，从而形成了全国层面的产业布局。

2.4.2 城市化进程下的市镇体系

等级规模。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城镇化的先行区，吴江县发展成为城市化地区，成为苏州市的直辖区。吴江从 2000 年起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乡镇数量几度缩减后，至 2019 年底形成了 4 个街道和 7 个镇的城镇格局，相比 1985 年减少了 13 个市镇。市镇等级方面，由于缺少官方的商业户数统计数据，本研究借助“大众点评网”查询各镇商户数量，根据商户数量将市镇分为两档：①中心市镇（工商户数大于 1000 家）；②标准市镇（工商户数小于 1000 家）⁸。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些

市镇在行政建制上已经撤销并入其他镇，但商户位置仍然显示在该镇，且商户数量较大⁹。由此可见，这些市镇实际上并未“消失”，仍然具有较强的商业服务功能。因此本文在分析市镇网络时，仍然将这些市镇作为独立的市镇，包括芦墟、莘塔、菀坪、金家坝、北厍和庙港。按此标准，吴江区共有中心市镇 11 个（松陵、江陵、盛泽、同里、黎里、平望、芦墟、震泽、横扇、七都、桃源），标准市镇 6 个（北厍、金家坝、莘塔、菀坪、八坼、庙港），两级市镇的数量占比分别为 64.71%、35.29%。人口分布方面，92.2% 的市镇人口集中到中心市镇，7.8% 的人口在标准市镇，可见中心市镇的极化现象再次凸显，资源进一步向中心市镇集中。

职能类型。为了发挥产业集群优势，产业经济开发区的模式备受推崇，尤其是在具有政策、区位优势东南沿海地区。自 1992 年，吴江先后成立了 4 个开发区（吴江开发区、汾湖高新区、吴江高新区、东太湖度假区），并且通过实行“区镇合一”管理体制，使得具有行政意义的镇与具有产业优势的开发区实现共赢。吴江当前四大主导工业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四大开发区内。但从市镇角度来考量，江陵、黎里、盛泽是产业集中区，松陵、桃源、震泽、七都也都是产业重镇，但各市镇的产业门类普遍向综合型转变，除盛泽镇的丝绸纺织业仍占据全镇产业主导外，其余市镇均无绝对的主导产业。

空间分布。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吴江区市镇体系的南北差异开始倒置，南强北弱逐渐转为南弱北强。2019 年对比 1985 年，北部地区市镇数量维持 11 个不变，平均密度为 165.04 个/万 km²；南部地区则减少了 6 个，至 6 个，平均密度降至 122.61 个/万 km²。人口方面，此时期北部地区市镇人口为 383322 人，占全部市镇人口的 55.6%，而南部地区市镇人口为 305932 人，占比为 44.4%，可见无论是市镇数量，还是市镇人口规模，南北都出现了倒置。

这与南北部产业格局的变化直接相关。吴江区的 4 个开发区中，北部占了 3 个，而南部则仅有 1 个，新兴的电子资讯业、光电缆业和装备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几个开发区内，而丝绸纺织业则仍然集中在以盛泽为中心的南部地区。随着传统蚕桑织业的萎缩，南部市镇网络不再具有优势，相反，其它高新产业的崛起，尤其是产业开发区的布局，使得北部地区更加获益，市镇体系也日益发达（图 8）。市场经济打破了之前匀质化分布的城镇网络，转而依据产业发展重心调整为非均衡的城镇网络。在生产力飞速发展，产业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现有的产业网络早已超越区域范围，而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相反，本地市镇构建的产业联系网络逐渐淡化，相邻市镇（镇际）之间的产业联系逐渐被更大范围包含国内国外的产业网络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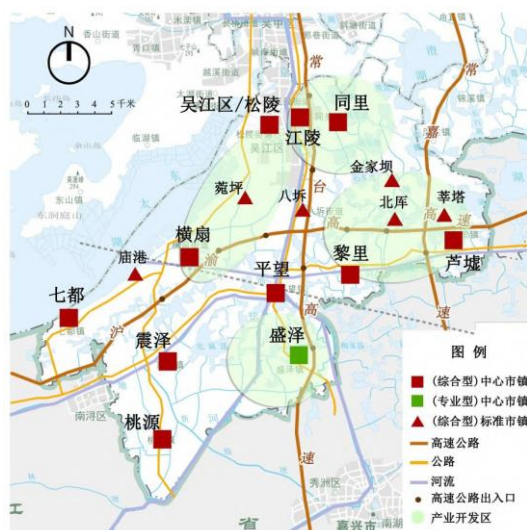


图 8 2019 年吴江区市镇网络

注：底图为 2019 年苏州市地图，来源：<http://map.ps123.net/china/23710.html>

3 结论与讨论

吴江产业及市镇体系的演变趋势可以梳理如下，并据此提出以下讨论与建议：

①产业因素与市镇体系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吴江的案例充分证明，首先，产业的盛衰直接影响着市镇体系的发达程度：1930年代以前产业兴盛，形成了三级市镇网络，1930年代以后产业衰落，市镇网络也逐渐趋弱。其次，不同类型的产业形成不同的市镇体系：平原地区比较容易形成克里斯特勒的“六边形网络结构模式”，吴江一般工商业简单的供需关系基本对应了网状市镇组织模式；蚕桑丝织业（各专业镇）的镇际上下游产业链组织关系对应了枝状市镇组织模式（产业走廊模式）。再次，蚕桑丝织业相比一般工商业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专业型市镇相比于综合型市镇的波动性更大。最后，市镇体系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除产业因素外，还受到行政区划调整、战争、偶然事件、政策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如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撤乡并镇、设立经济开发区等行为，对市镇体系造成巨大、直接的影响，因此很难排除这些因素而单论产业的作用，这也是造成当前产业因素对市镇体系的影响比较模糊的直接原因。

②无论是传统产业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都应该重视产业与市镇体系的关联。在传统产业的保护与传承方面，要注意区分一般工商业和蚕桑丝织业等大型产业的不同，对于后者，尤其要强调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不可孤立保护，如当前仅仅保护某几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遗”的做法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保持产业链的相对完整性。在历史城镇的保护与发展方面，要挖掘产业赋予城镇的特殊意义，包括因产业职能所形成的城镇空间个性，以及因产业关联所形成的城镇网络，如丝绸业城镇既要体现出与一般城镇的不同之处，又要加强不同产业环节丝绸业城镇之间的联系，这有助于避免当前“千镇一面”的困境，也可以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旅游提供有效的途径。

参考文献：

- [1]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2]Taylor P.J. World City Network:A Global Urban Analysi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
- [3]李晓江，郑德高. 人口城镇化特征与国家城镇体系构建[J]. 城市规划学刊，2017(1):19-29.
- [4]顾朝林，张勤. 新时期城镇体系规划理论与方法[J]. 城市规划汇刊，1997(2):14-26, 65.
- [5]胡序威. 有关城市化与城镇体系规划的若干思考[J]. 城市规划，2000(1):16-20, 64.
- [6]钮心毅，王焱，丁亮.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城镇体系的等级结构[J]. 规划师，2017, 33(1):50-56.
- [7]陈彦光，周一星. 豫北地区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多分形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6):810-818.
- [8]李震，顾朝林，姚士煤. 当代中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结构类型定量研究[J]. 地理科学，2006(5):5544-5550.
- [9]顾朝林. 中国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模型及其结构预测[J]. 经济地理，1990, 10(3):54-56.
- [10]覃丽君，金晓斌，蒋宇超，等. 近六百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格局演变分析[J]. 地理研究，2019, 38(5):1045-1062.

-
- [11]钟洋,林爱文,胡碧松,等.基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的长江经济带城镇体系空间格局演变(1992~2013)[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8,27(10):2162-2171.
- [12]王红霞.多中心化空间演变进程中的城镇体系建设——以上海为例的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9(1):13-22.
- [13]吕卓民.试论陕北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演变[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5):821-826.
- [14]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 [15]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新史学,1998(3):87-134.
- [16][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7]盛泽镇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盛泽镇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8][清]陈纘,丁元正,修.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乾隆吴江县志[M].[清]倪师孟,沈彤,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19]陆希刚.明清江南城镇[D].上海:同济大学,2006.
- [20]张小林.乡村空间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以苏南为例[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 [21][美]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卷2):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 [22]吴江丝绸志编纂委员会.吴江丝绸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 [23]任新保.江苏省的农村工业生产与生产力的合理布局[J].经济地理,1983,3(1):36-40.
- [24]张立群.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转型刻不容缓[J].农村经营管理,2013(1):30.

注释:

1 1934年调查数据见《吴江县政》第2卷第2、3期合刊。

2 1954年调查数据查自苏州市档案馆档案,卷宗号:H44-06-30。

3(1)根据《弘治吴江县志》记载。

4(2)根据《乾隆吴江县志》《乾隆震泽县志》统计。

5(3)平望镇凭借大运河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苏州米粮交易中心,与枫桥、浒墅关并称为三大米市,米粮业在该镇产业中的占比也远超过一般工商业。但与蚕丝织业、棉花棉织业不同的是,米粮业在江南地区内部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

链，即不存在生产联系，而仅仅是贸易联系，因此本研究将米粮业市镇也纳入综合型市镇范畴。

6(1) 由于这一时期工商户数普遍缩减，因此对原有标准进行折减，即以 100 家作为区分。

7(1) 数据源自《中国纺织工业年鉴》(1982、1994、2020 年)。

8(2) 由于这一时期工商户数大幅增加，因此对原有标准再次调整，即以 1 000 家作为区分。

9(3) 典型的如黎里镇，该镇于 2006 年将黎里、芦墟、北厍、金家坝、莘塔 5 个乡镇合并为汾湖镇，后又改名为新“黎里镇”，但这几个乡镇位置分离，并未连成整体，仍然是相对独立的发展单元。